

文景

Literary
Landscape
第2辑

雨果，值得永远纪念的大作家

吴岳添

拔地苍松有远声

张汝伦

想象力 的 陷阱

叶开

布迪厄，使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

陈彦

哈利·波特的经济魔法

梁小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题：水墨菜单

1996 作

材料：靠椅、毛笔、瓷杯、铜粉、墨等

收藏：香港艺术馆

展出：纽约PSI、旧金山现代美术馆、墨西哥美术馆、澳大利亚悉尼美术馆、
香港艺术馆等。

作者：王天德

目录

专题 法国文学

- | | | |
|----|------------------------------------|-----|
| 3 | 雨果，值得永远纪念的大作家 | 吴岳添 |
| 9 | 未满足欲望之神 祭坛上的火
——读戈蒂叶的《德·莫班小姐》 | 谈瀛洲 |
| 15 | 在普罗旺斯明净的天空下
——读马塞尔·帕尼奥尔《我父亲的光荣》 | 王 璞 |
| 19 | 在海边墓穴上咀嚼玫瑰花瓣
——读《瓦雷里与纪德通信选》 | 章乐天 |
| 23 | “我是一片云”
——弗朗索瓦·程的《天一说》及其他 | 朱 静 |
-

思考

- | | | |
|----|--------------------------------------|-----|
| 29 | 求实与创新
——史正富及其《现代企业中的劳动与价值》 | 潘英丽 |
| 35 | 欧洲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
——读列奥内尔·若斯潘《现代社会主义》 | 殷叙彝 |
| 42 | 概说现代性 | 瞿一凡 |
-

阅读

- | | | |
|----|-------------------------------------|-----|
| 51 | 拔地苍松有远声
——读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和《九十年代日记》 | 张汝伦 |
| 56 | 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
——读《帝国的回忆》 | 周振鹤 |
| 59 | 话说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 | 钱 钢 |
| 63 | 小说家：上帝和人的两位一体
——《阅读大师》中的马原及其小说观 | 郭春林 |

- | | | |
|----|------------------------|-----|
| 68 | 想象力的陷阱 | 叶 开 |
| | ——读《许三观卖血记》 | |
| 74 | 建筑史的经典之作 | 顾孟潮 |
| 77 | “如果你把我当作你的惟一，我就让你成为第一” | 吴献雅 |
-

剪影

- | | | |
|----|-----------------|-----|
| 80 | 布迪厄，使穷人感到骄傲的理论家 | 陈 彦 |
| 87 | 跟奥尔森教授学习政治经济学 | 张宇燕 |
| 94 | “后现代”思想之父利奥达 | 汪堂家 |
-

札记

- | | | |
|-----|------------|-----|
| 99 | 哈利·波特的经济魔法 | 梁小民 |
| 103 | 秧马能用于插秧吗 | 顾 静 |
| | ——史料学漫谈之一 | |
-

声像

- | | | |
|-----|--------------|-----|
| 106 | 家与乡愁 | 曹利群 |
| 109 | 以电影为家 | 孙小宁 |
| 112 | 好莱坞渴望真情 | 于 田 |
| 115 | 此时无声胜有声 | 何 风 |
| | ——王天德和他的水墨语言 | |
-

远行

- | | | |
|-----|----------------|-----|
| 117 | 从西25街到麦迪逊大道的一日 | 任 晓 |
| 120 | 建筑师、女皇和宠臣 | 闻 一 |
| | ——记爱尔米塔什博物馆 | |
-

- | | |
|------|------------------------------|
| 字里行间 | (126, 小 蒙) |
| 世纪书情 | (22,41,86,93,98,102,111,125) |
| 编辑书后 | (128) |

雨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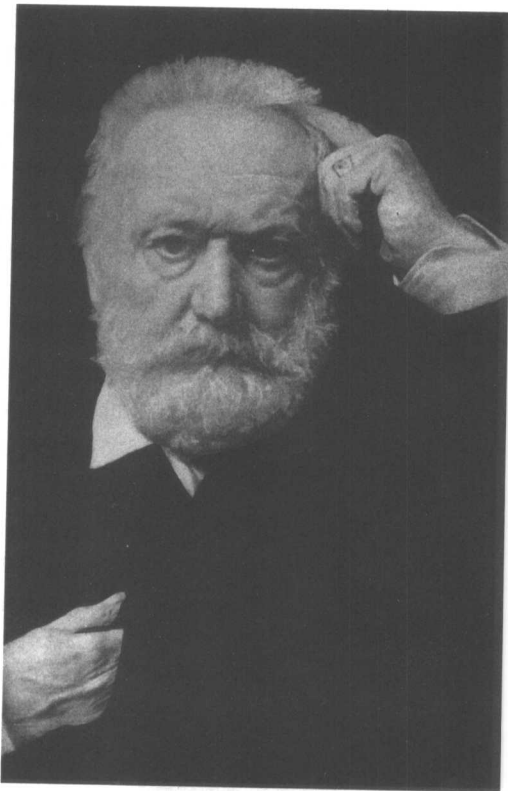
值得永远纪念的大作家

■ 吴岳添

今年2月26日，是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雨果是举世闻名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政论家和文艺理论家，一向以本国的灿烂文化而自豪的法国，自然是郑重其事、隆重庆祝，所以特地把今年命名为“雨果年”。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十八家文化机构，也从今年1月5日开始举办纪念大会和学术讨论会，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雨果在法国和世界文化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法国纪念雨果的活动，决不是虚应故事或者临阵磨枪，而是酝酿已久、水到渠成。因此一进入2002年，不但雨果的各种作品和文集大量再版，而且关于雨果的画册、传记、论文也如潮水般地蜂拥而来。其中在传记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让-马尔克·霍瓦斯的《维克多·雨果》，（第一卷，《流亡之前》，1802-1851），仅仅这一卷就厚达1400页，第二卷定于年内出版。另一部《维克多·雨果》也是两卷本，作者是以写作《戴高乐》和《拿破仑》著称的马克斯·加罗，该书所有章节的标题都取自雨果的作品。另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是《维克多·雨果——朱丽埃特·德鲁埃通信集（1833-1883）》：人所共知，朱丽埃特和雨果是长达五十年的情侣。

雨果在生前就被人们比作喜马拉雅山和海洋，这首先是指他的创作时间之长和数量之多。多到什么程度？仅就诗歌而言，他在生前出版了十九卷，身后又经人整理出版了六卷，共计153837行。也就是说，如果从呱呱坠地算起直到雨果去世的那一天为止，他平均每天要写六行诗。这还不算他多达三百万字的长篇和中短篇小说，九个剧本、十多卷政论、随笔和游记，以及大量的书信。法国文学史上的高产作家不止一位，不过大仲马的小说虽然多达数百部，但大多是与人合作的；巴尔扎克的小说数量惊人，可惜他寿命太短，而且毕竟只是小说家，所以像雨果这样创作了



Victor Hugo (1802 — 1885)

六十余年，而且在诗歌、戏剧和小说方面都取得了光辉成就的大作家，在法国文学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以至于法国《读书》杂志第302期（2002年2月）在报道纪念雨果的活动时，竟用了《雨果是否写得太多了？》这个标题。从3月20日到6月23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也将以《雨果，大海般的伟人》为题，举办为期三个月的雨果作品展。

雨果的作品如此丰硕，当然因为他是个神童和天才，但是天才是要靠勤奋来培育的。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背诵二十五至三十行古罗马诗人维吉尔或贺拉斯的诗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就把它们译成法文。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十多岁时就写了成千上万行的诗歌。在二十六岁时就出版了十卷本的作品全集。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有个人曾经证实他每天写二百行诗歌，而且以行数来记录每天的收入，与此同时，他还拟订了二十个剧本的写作提纲！

雨果的非凡之处，还在于他的命运的奇特。历史上以诗歌成名的作家很多，例如波德莱尔和魏尔兰等等，但大多潦倒不堪。同时代的拉马丁甚至在1848年革命时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实际首脑，最后却销声匿迹，被人遗忘。只有雨果随着岁月的流逝日益成熟，放射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因为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像启蒙时代的伏尔泰、卢梭和后来的萨特一样，是为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写作的。由于母亲保守思想的影响，他在青年时代曾同情保王党，歌颂过王朝和天主教。后来他的思想逐渐发生了变化，诗集的内容也涉及到了政治、哲理、祖国、家庭、爱情和杂感等种种题材，例

如同情和支持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集》（1829），描

写家庭生活 and 内心感情、对贫苦受难者表示同情和怜悯的《秋叶集》

（1831），欢呼七月革命和歌唱爱情的《黄昏歌集》（1835），讽刺富有阶级、宣扬慈善主义的《心声集》（1837），以及企图在精神上引导民

众的《光与影集》（1840）。他同时注重对诗句形式和语言的革新，使

他的诗作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在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恢复帝制之后，雨果作为国民议会中的左派领袖发表演说，鼓舞民众

起义反抗，结果遭到镇压，被迫化装成一个排字工人逃到了比利时，接着又先后居住在英国的泽西岛和盖纳西岛，在国外流亡长达十九年

之久。这段经历使雨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在流亡期间写出了《小拿破仑》（1852）等檄文，发表了辛辣讽刺拿破仑第三背信弃义

的《惩罚集》（1853）、题材多样的《静观集》（1856）和大型史诗《历代

传说》（1859）等诗篇，改抒个人之情为抒民族之情、抒爱国之情，吹响了反对专制统治、歌颂光明和进步的斗争号角，同时使用富有表现力的跨行，大胆地改变了音节的顿挫，使这些感情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形象丰富的诗篇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杰作，雨果也因此而成为杰出的民主斗士和法兰西不朽的民族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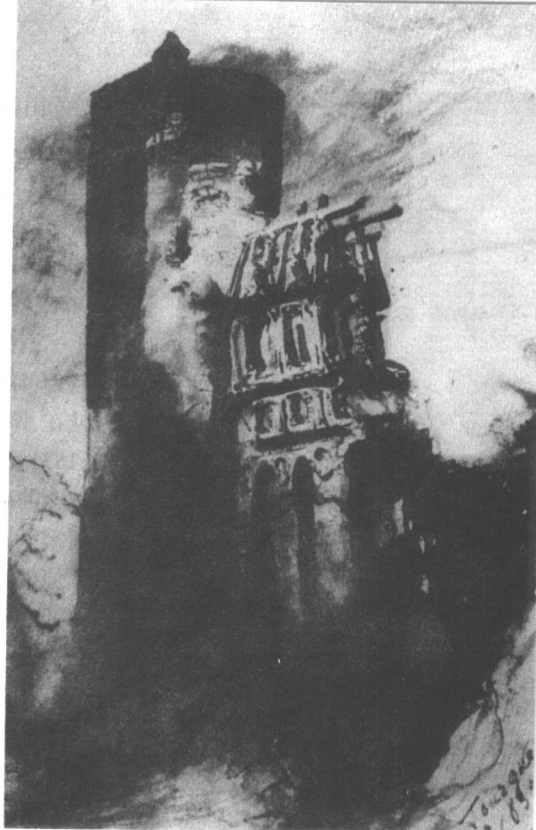


当雨果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背诵25-30行古罗马诗人的诗歌，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就把它们译成法文。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雨果固然早就有“我要用剑来完成拿破仑未完成的事业”的雄心，但他的崭露头角也是与古典主义处于穷途末路的形势分不开的。近代的世界以西欧最为发达，而法国又是西欧的一个中心，它在十七世纪成为西欧最强大的封建君主制国家，“太阳王”路易十四被各国君主奉为楷模，为绝对王权服务的古典主义文化也就应运而生。古典主义歌颂王公贵族，鼓吹以理性克制感情，而且从宫廷礼仪到贵族沙龙，从饮食服饰到言谈举止，都有一整套讲究高贵典雅的礼仪，从而使得法国的一切都成了欧洲各国宫廷模仿的榜样，上流社会里人们都会说法语为荣。因此古典主义在欧洲的统治得以持续了一两百年之久，直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才被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打开了一个缺口。然而在拿破仑的独裁统治之下，刚刚萌芽的浪漫主义没有发展的余地。直到拿破仑垮台，雨果等一代新人才高举浪漫主义的大旗，向古典主义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雨果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向浪漫主义的。1827年，他发表剧本《克伦威尔》，在序言里猛烈抨击了古典主义的种种清规戒律，主张自然中存在的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题材，并且提出了将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进行对照的审美原则，从而使这篇序言成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宣言。他的剧本《欧那尼》（1830）的上演，引起了两派观众的争论和殴斗，这次“欧那尼事件”就成了浪漫主义战胜古典主义的标志。雨果的一系列剧本都是与古典主义的规则针锋相对的，例如《玛丽蓉·德·洛尔墨》（1831）歌颂了平民出身的青年狄杰和妓女玛丽蓉的爱情；《国王取乐》（1832）写平民姑娘爱上了乔装的国王；《玛丽·都铎》（1833）里的王后爱上了宠臣，而《吕伊·布拉斯》（1838）里与王后相爱的竟是一个仆人等等，总之都是爱情至上，小人物比大人物高尚，因此受到了被古典主义长期压抑的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27岁的雨果也因此成为浪漫主义的领袖。

浪漫主义是法国十九世纪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此后浪漫主义进一步发展和分化，但可以说十九世纪的其他文学流派都是由浪漫主义派生出来的。例如巴尔扎克和斯丹达尔等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们原来都是浪漫主义者；就连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左拉，他早期和晚期的小说也具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雨果和他领导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法国十九世纪的文学就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浪漫主义戏剧在四十年代盛极而衰之后，小说代替戏剧成了浪漫主义的主要体裁。法国浪漫主义的小说有四种类型：雨果的社会小说、大仲马的通俗小说、乔治·



雨果的绘画《圆堡》，作于1835年。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雨果逐渐从保守立场转向浪漫主义。

桑的田园小说和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四类小说各有特色，但是只有雨果怀着济世救民的崇高理想，试图用人道主义精神去拯救世界，才创作出了《悲惨世界》那样的杰作，达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高度，赋予了浪漫主义文学以新的生命力。因此就小说本身而言，浪漫主义文学在法国的繁荣，与雨果本人在创作上的重大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雨果孜孜不倦地宣扬的政治理想是人道主义，由于他的小说的巨大影响，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人道主义的同义词。早在1829年，他就在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里呼吁废除死刑。《巴黎圣母院》（1831）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人所共知，它在政治上揭露了天主教会的虚伪和黑暗，抨击了封建司法制度的不公和残酷；在艺术上将敲钟人卡西莫多与副主教弗罗洛进行对照，集中体现了雨果的创作原则：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弗罗洛心如蛇蝎，而外形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却善良高尚，人物性格的夸张充分显示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雨果历时十六年才完成的巨著《悲惨世界》，是他的人道主义理想的集中体现。主人公冉阿让由于偷了一片面包而在牢里被关了十九年，出狱后在宽大为怀的卡福汝主教的感化下改过自新，改名为马德兰。他发财致富后乐善好施，当上了市长，并且拯救了沦为妓女的女工芳汀。这时警方断定一个小偷就是冉阿让，他为了不连累别人就挺身而出，在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被捕，芳汀因此惊吓而死。后来冉阿让利用抢救一个海员的机会假装坠海死去，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之后，他终于把芳汀的私生女柯赛特抚养成人。小说通过对穷人苦难的真实描绘，对社会的黑暗和司法的不公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宣扬了仁慈博爱可以杜绝罪恶和拯救人类的人道主义思想。正如他在序言中指出的那样：“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惟其如此，《悲惨世界》才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其他小说也是如此。《海上劳工》（1866）写渔民吉里亚特为了爱情而在海上搏斗，战胜了狂风恶浪和章鱼暗礁等千难万险，事后却发现未婚妻爱着青年牧师，他为了成全别人的幸福而在海水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小说以此歌颂了劳动者不怕艰险和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笑面人》（1869）取材于十七和十八世纪之交的英国，通过贵族后裔关伯伦的悲惨遭遇，将封建贵族的丑恶与劳动人民的善良进行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小说都内容丰富、情节感人，蕴含着向非正义宣战的浪漫主义激情。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九

三年》(1874),内容是反革命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在逃跑的时候,为了救出在火中的三个孩子而被捕,共和国军队的司令官郭文为此私自放走了侯爵,结果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但是判处他死刑的法官薛木尔登的内心也十分矛盾,最后在郭文被处决的同时开枪自杀。小说宣扬了“在人世的一切问题之上,还有人心的无限仁慈”的观点,这在当时巴黎公社起义被残酷镇压、公社社员们面临死亡威胁的形势下,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雨果的斗志是坚定的。1859年,拿破仑第三对他予以特赦,但是他拒绝回国。他在写作的同时,也把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付诸实践。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他发表了著名的抗议信,愤怒地谴责了侵略军毁灭东方文化的罪恶行径。1862年,法军入侵墨西哥,他写信号召墨西哥人民进行抵抗;1863年,他支持波兰人民反抗俄国沙皇的斗争;1868年,他在瑞士洛桑主持世界和平大会。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拿破仑第三被俘垮台,雨果回到法国,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他立即投入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发表演说,探望伤员,捐款购买大炮。巴黎公社失败以后,他呼吁赦免公社战士,并且开放自己在布鲁塞尔的住所供社员们避难。其他如给穷人的馈赠之类的行为不胜枚举,例如从1862年起,他每个星期招待圣皮埃尔港四十个穷孩子一顿晚饭。凡此种种,都表明他宣扬的人道主义并非空谈,而是贯彻始终、身体力行。正因为如此,雨果才在法国人道主义传统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中世纪的人文主义精神使人们摆脱了神权的桎梏,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主张人人生而平等,应该享有作为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法国大革命则是实践这一理想的尝试。雨果倡导的人道主义,正是继承了这种进步传统,并且成为维系启蒙思想家与罗曼·罗兰等现代作家的纽带。

雨果之所以能在困境中百折不挠,一生始终笔耕不辍,这与他健康的体魄和过人的精力也是分不开的。他对女性美的不倦追求尽人皆知,不过他在对女演员到侍女乃至各种轻佻女人都怀着强烈兴趣的同时,也能把短暂的情欲变成长达五十年的爱情故事。在刚刚出版的《维克多·雨果——朱丽埃特·德鲁埃通信集(1833-1883)》里,年届古稀的雨果还像个老罗密欧一样,给他的年老色衰的朱丽叶特写了这样一首诗:

我有两个生日,都在2月份。

在母亲的怀抱里获得了生命。

1833年2月16日,我第二次诞生,

在你的怀抱里获得了爱情。

第一次诞生给了我光明,

第二次诞生赋予我激情。



雨果的绘画《戴软边帽的女子》

雨果直到晚年仍坚持创作，完成了诗集《做祖父的艺术》（1877），因而以模范祖父著称。由于他几乎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自然难免受到同代人的嫉妒。波德莱尔最初崇拜他，后来却说他粗俗，说他证明了一个人可以既是天才又是傻瓜。福楼拜最了解雨果，也与波德莱尔有类似的看法，但是归根结底，他认为“我们在有些人面前要欠身相让，说‘您先请’，雨果就属于这一类人。”所以在1862年，他是等雨果的《悲惨世界》出版以后才发表自己的小说《萨朗波》的。

这种对雨果的尊敬从他的生前延续到身后。1881年2月26日，六十万巴黎人在他窗前游行，庆贺他的八十寿辰，中小学在这一天还一律取消对学生的处分。他在1883年的遗嘱里宣布给穷人五万法郎，并希望用穷人的送葬马车把他的灵柩送到墓地。雨果在1885年5月18日去世，法国政府和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由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二百万人排成的行列，把他的遗体送进了伟人公墓。

我国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介绍雨果及其作品，他的《悲惨世界》等小说，早在“五四”时期就译成了中文。解放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雨果的小说得到了再版或重译，像李丹的《悲惨世界》，郑永慧的《九三年》、《笑面人》，管震湖的《巴黎圣母院》等。雨果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位诗人、戏剧家和小说家，而我国读者则通常以为雨果首先是个小说家。这是因为虽然有闻家骅、沈宝基、张秋红等翻译了雨果的诗歌，许渊冲翻译了雨果的戏剧，柳鸣九翻译了雨果的文论，但是这些方面的中译本毕竟还很少，而且大多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翻译的，更何况诗歌和戏剧的读者本来就比小说的读者少得多。相反，《悲惨世界》等小说不仅有好几个版本，而且还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剧，所以他的小说不仅影响过郭沫若和巴金等一代大师，而且在我国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影响。现在雨果作品的最全面的的中译本是柳鸣九主编的二十卷《雨果文集》，1998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刚刚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雨果文集》。

雨果的生平和作品是如此丰富，所以后人研究雨果的著作自然也不可胜数。据那位传记作家让-马尔克·霍瓦斯计算，每天阅读十四个小时，要花上二十年的时间，才能把法国国家图书馆里关于雨果的著作读完。这种趋势今后无疑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还在为争取生存权和发展权等最基本的人权而斗争，雨果所说的贫穷使男人道德败坏、饥饿使女人堕落的状况，还远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所以雨果毕生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进步的现实意义，依然值得发扬光大。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吗？

未满足欲望之神

祭坛上的火

——读戈蒂叶的《德·莫班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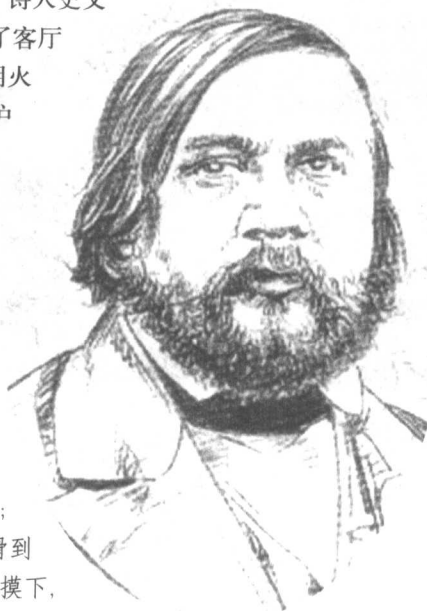
■ 谈瀛洲

在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在英国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读物。诗人史文朋在他的密友特里夫连夫人处，把一册巴尔扎克的小说忘在了客厅里的沙发上，被夫人的丈夫特里夫连爵士看见了。后者居然用火钳将其夹起，就像上面有致命的传染病菌一样，扔进了火炉里！

当然，如果我们读到在1835年出版的像《德·莫班小姐》这样的法国小说中描写性爱与女性人体美的比较“露骨”的段落，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爵士大人的道德怒火了。例如，书中写到年轻美丽的孀居贵妇萝塞特在午夜潜入了她热恋的骑士戴奥多尔——女扮男装的玛德莱娜·德·莫班——的房间。玛德莱娜还想保住自己的真实性别的秘密，因此她既不能告诉萝塞特她是女人，也不能接受她的示爱。但在这样尴尬的情形中，她还是感到为一种奇特的情欲所诱惑：

我被打动了，给了萝塞特比寻常更多的几次温柔的拥抱；我的手从她的头发上滑到了她天鹅绒般柔软的颈上，然后又滑到了她光滑圆润的肩上，温柔地抚摸着它颤动的曲线。在我的抚摸下，她的身体就像乐器的键盘在音乐家的触动下跳动着；她的肉体颤抖着，爱的激动传遍了全身。

……我的手离开了她的肩，利用绉褶当中的一个开口突然握住了她小巧受惊的乳房，它惊慌地跳动着，就像一只在窝里遭到突袭的斑鸠；——我轻轻地、几乎令她感觉不到地亲吻着她的面颊，这时我把嘴唇从她面颊的边缘移到了她半张开的嘴唇上。



Théophile Gautier(1811-1872)

相比之下,1915年D.H.劳伦斯的《虹》这本在今天看来相当乏味的书在英国出版,还要引起评论界的一阵骚动,被警察当局宣布为淫书并加以禁止,不免要令人嗤笑英国人的古板了。法国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已经相当开放,而英国人也许过了一百年,才达到相同的开放程度。

[1] Mademoiselle de Maupin

戈蒂叶的《德·莫班小姐》^[1],碰巧又是史文朋激赏的一部法国小说。他在牛津读书期间,就已读了此书,并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十四行诗,其间有这样的几句:

这是一部金子般的书,充满活力与机智,
是一部美的圣典,用梦想与无瑕的辞句和思想
编织而成……

它是一切优美爱情的最高峰。

人们在阅读的一喘息之间

就会感到灵魂在燃烧

就像未满足欲望之神祭坛上的火。

史文朋之所以给予《德·莫班小姐》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它不单单是唯美主义的一部宣言书,还是一部满足了十九世纪人们对女同性恋与男同性恋(因为戴奥多尔是女扮男装,所以达尔贝对她的爱也暗示着男同性恋)的极大好奇的书。它也给了史文朋以启发,使他后来写作了一系列以女同性恋为题材的作品。

二

戴奥菲尔·戈蒂叶最先是作为维克多·雨果和浪漫主义的狂热追随者出现在法国文学史里面的。1830年2月25日,雨果的剧本《欧那尼》在法兰西剧院上演。支持浪漫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两派,在戏开演之前便在摩拳擦掌。这时,穿着一件鲜红缎子背心的戈蒂叶出现在雨果的支持者里面,在周围以灰色与黑色为基调的服装背景之下,就像一块激怒公牛的红布——演出一结束,两派就大打出手。结果是,浪漫主义不管是在拳头上还是在文学上都大获全胜。

尽管拳头并非解决文学争端的最好手段,但当时法国人对于文学的热情还是令人向往的。除了法国人之外,世界上还有哪国人会为了文学上的主义之争而拔拳相向,不惜打得头破血流呢?

在《德·莫班小姐》的著名《序言》里,戈蒂叶对评论家与新闻记者大张挞伐,指责他们片面地抬高新古典主义,贬低浪漫主义,过多地从道德观点出发对文学进行粗暴地批判。他举出莫里哀的例子证明,新古典主义作家



们并没有现在的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正经：

我们在伟大的莫里哀喜剧中又看到了什么呢？神圣的婚姻制度……在每一幕中都受到了奚落和嘲弄。

剧中的丈夫老态龙钟，丑陋无比，弱不禁风，他歪戴假发，身穿过时衣服，手拄弯头拐杖，加上烟熏的酒糟鼻子、短短的腿和银行家似的大肚子……

情夫总是年轻、标致、洒脱，至少是气质不凡。他上场时轻声哼着最新流行的库特兰舞曲。他毫不在乎地在台上走几步，俨然是世界上最得意的人。

戈蒂叶这样写，不是为了贬低莫里哀，而是为了说明，当时在法国受到崇拜、被奉为主臬的新古典主义大师们的作品，跟正在受到攻击的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一样“不道德”。也许，伟大的文学作品一直都是“不道德”，或超越一时一地的社会道德的。尼采所著的《超越善恶》(1886)，也许不过是当时的这一文学与艺术上的思潮后来在哲学上的结晶。

但这篇《序言》又不完全是一篇浪漫主义的辩护辞。戈蒂叶也并非彻底的浪漫主义者。或者说，他从一个浪漫主义者开始，不久就走到自己独辟的蹊径上去了。在这篇发表于《欧那尼》事件五年之后的《序言》中，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始显露出自己的个性：

没有什么美的东西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可以铲除鲜花，世界并不因此在物质方面会感到痛苦，然而谁又希望世上没有鲜花呢？我情愿不要土豆而要玫瑰花。我相信世上只有功利主义者才会把花坛上的郁金香全部拔掉而改种大白菜。

……

真正称得上美的东西只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丑的，因为它体现了某种需要。而人的需要就像其可怜虚弱的天性一样是极其肮脏、令人作呕的——一所房子里最有用的地方就是厕所。

这段话的核心正是“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是说，艺术并不服务于或者说是超越了道德与功利的目的。它只追求美，而这，正是唯美主义的核心。从这一点上来说，他是后来的唯美主义者如史文朋、佩特、于斯曼和王尔德等人的思想资源。

这篇《序言》尽管名气很大，从今天来看作为一篇文章还是有种种的缺陷。作者的语气太激动、太急躁，他一下子想说出太多的东西，以致有时读者很难抓住他的意思。但这是他身上的浪漫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带给他的缺陷。这部小说本身也带有同样的缺点。



《德·莫班小姐》在1835年出版后，马上被雨果和巴尔扎克称为杰作。但它并不是一部“完美”的书，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所会写出的一部精雕细琢的作品。它前后的风格并不统一。

书中的男主人公诗人达尔贝是一个追求浪漫的理想之爱的青年。可是他的理想太高、太完美了，在生活中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找一个情妇。她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罗塞特。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达尔贝也不是罗塞特理想中的爱人。在遇到达尔贝之前罗塞特就爱上了戴奥多尔，后者也很喜欢她，可是因为自己隐瞒的性别无法回报她的爱。为了保护自己的妹妹的荣誉，罗塞特的哥哥给戴奥多尔下了最后通牒：要么娶他的妹妹，要么接受他的挑战。戴奥多尔只能选择了后者。他在决斗中重伤了（他当时以为是刺死了）罗塞特的哥哥，觉得无面目再见她，就远走高飞，留下罗塞特一人伤心痛苦。

达尔贝为未能真正爱上罗塞特，却又离不开她而感到自责，一直郁郁寡欢。罗塞特带他到乡下姑妈家的一所城堡小住。几天后，一位年轻美貌的骑士前来作客，他就是与罗塞特久别重逢的戴奥多尔。

达尔贝惊异于戴奥多尔的美貌：“那美丽的突厥人般的睫毛，那深沉而又清澈的凝视，那皮肤温暖的淡琥珀色，那黑色光亮的长发，那精致自信的鼻子，那一如帕米贾尼诺画中的关节与柔软修长的四肢，那美好的曲线，那完美的椭圆形脸蛋，使得她显得如此优雅高贵，我一切想望的品质，如果分散在五、六个人身上就会让我欢喜不置，却集中于他一人。”作为一个唯美主义者，他追求的是整体的美，不能容忍身体一部分的美为另一部分的缺陷所破坏。戴奥多尔符合达尔贝对完美的要求。达尔贝爱上了他。可是，他又怎么能爱上一名男子呢？达尔贝生活在新的痛苦之中。

看到戴奥多尔，罗塞特对他的爱火重又燃起。可她记得，戴奥多尔对她说过，他有无从明言的原因，使他无法爱她。她只得勉强压抑自己的爱情。

这时，戈蒂叶利用了西方文学中易装癖与男、女同性恋暗示的一个重要资源：莎士比亚戏剧。他让书中的人物为了自娱，演出了一场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戴奥多尔扮演剧中女扮男装的公爵小姐罗莎琳。莎士比亚时的剧团中的演员皆为男子，如我国旧时的京剧，故由戴奥多尔扮演罗莎琳并没什么不妥，反而正符合莎剧的传统。但罗莎琳的女扮男装原来是男扮女扮男，而戴奥多尔扮罗莎琳则是女扮男扮女扮男，这真是让人头晕脑涨！但这样扮来



扮去的，戈蒂叶想要说明的也许不过是美可以脱离性别，对美的爱也可以脱离性别而存在。

达尔贝与萝塞特在惊喜于戴奥多尔所扮的罗莎琳的美丽的同时，都突然意识到，他其实就是个女子。达尔贝不再为自己的“变态”而折磨自己，萝塞特也终于明白戴奥多尔所指的无法明言的障碍究竟是什么。达尔贝给“罗莎琳”写了一封热烈的情书。

一天晚上，女装的玛德莱娜·德·莫班终于来到达尔贝的房间，与他一夜销魂。之后她又飘然进入萝塞特的房间，直到中午才出来。在萝塞特的房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戈蒂叶没有正面描写，只是给了我们如下的暗示：

“萝塞特的侍女告诉了我这一奇怪的情形：尽管她的女主人那天晚上没有跟她的情夫同睡，但床上的寝具还是被弄得杂乱无章而且留下了两个身体的印子。她还给我看了两粒珍珠，跟戴奥多尔演罗莎琳时所戴的完全相似。她是在铺床时发现它们的。”

书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当然是德·莫班小姐了，这个化装成男子英俊潇洒，作为女子令人魂销的“两性”尤物。其实中、外文学都对这种“两性”人物的特殊魅力感兴趣：中国版本的德·莫班小姐也许是花木兰，也许是武侠小说中无数女扮男装的女侠们。

戈蒂叶的德·莫班小姐并非全无来历。在十六世纪晚期路易十四的时代，法国确实有过一个德·莫班小姐。她是一个歌剧女演员，好女扮男装，同时受到两性的追逐，并因争风吃醋引发了无数决斗——她又是一个剑术专家，据说曾在一个晚上利用幕间休息之便，结果了三个向她挑战的男子。戈蒂叶笔下的德·莫班小姐并没有传说中的厉害：他只不过是写了刚出道时的德·莫班小姐，她的第一个男性与女性情人。

四

从这部书的前半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血气方刚的戈蒂叶，他身上还残留着太多的浪漫主义。这部书的前一百页，几乎全为诗人达尔贝喋喋不休的独白所占据。他那喷泉般的对爱与美的赞颂、对市侩与布尔乔亚气息的由衷轻蔑，滔滔不绝到了让人有些厌倦的地步。

但浪漫主义的戈蒂叶并不持久——浪漫主义者很少能有持久的。他们往往凭一股灵感奋力写去，到灵感竭尽之时就只能废然掷笔了。





后半部，也即德·莫班小姐出场以后的后半部，却在气质上与前半部不同。浪漫主义的戈蒂叶逐渐退场，唯美主义的戈蒂叶逐渐显现。

德·莫班小姐显然出场太晚。这位与书名同名的女主人公却在过了这本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以后才露面。很可能是戈蒂叶原来对此书的计划比我们现在所读到的要宏大得多，但写到后来发现笔力不继才改变了初衷。

唯美主义在文学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用文字来传达色、声、香、味、触之美。戈蒂叶身上的唯美主义，主要表现在他用文字给我们描述的那些视觉意象，那些“香艳”的图画上面。比如他对潜入戴奥多尔房中的罗塞特的描写：

这位美人只披了一件用极细的麻纱织成的夜用披肩，和缀着精细花边的无袖内衣……她的手臂完全赤裸着，像大理石一样光滑冰冷；遮掩着她身体的麻纱是如此地轻薄，以致我可以看见她的乳头，就像那些身上垂挂着湿衣的浴者的大理石雕像那样。

当然，有些评论家对他呈现给我们的这些“香艳”图画颇不以为然。比如1868年时美国的《大西洋月刊》对《德·莫班小姐》还有如下的评论：“它包含的一些描写，其品味大为可疑；有几页的内容简直是伤风败俗。”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大西洋两岸的两个英语国家，在性道德方面是同样地保守。

戈蒂叶曾经对龚古尔兄弟说，“我的惟一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我意识到了视觉世界的存在。”青年时代的戈蒂叶曾在画家里吾尔^[1]的画室里学习过绘画，直到他后来意识到自己缺乏成为一名伟大画家的天赋。但是，正是在里吾尔的画室里，他学会了观察，学会了欣赏色彩、线条、形体之美。他笔下的达尔贝，在脱去了玛德莱娜·德·莫班的衣服之后，想到的不是马上满足他的情欲，而是用画家——雕塑家的眼光，来细细地欣赏一番这个造化的杰作，“在他面前站着的形体集合了一切美的优点——纤巧与力量、色泽与姿态，它综合了希腊雕塑艺术达到顶点时期的线条与文艺复兴极盛时期的大画家提香的明暗色调。”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戈蒂叶的作品精神与浪漫主义的区别：浪漫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基督教的产物，浪漫主义之爱是一种无限的、精神的、不可能实现的爱，它是对理想的、非尘世的美的追求。戈蒂叶笔下的达尔贝也追求不可能之爱，但他的理想却可能短暂化为有实质、形体、色泽的东西。他虽说“精神性并不适合我”，但他却未能全然摆脱精神性。戈蒂叶身上混合了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混合了异教精神与基督教精神。这也是许多唯美主义者，包括于斯曼和王尔德，所有的一种双重性。

[1] Rioult

在普罗旺斯明净的天空下

——读马塞尔·帕尼奥尔

《我父亲的光荣》

■ 王璞

我特别爱读回忆录，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的小说《我父亲的光荣》之所以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它这个书名。读过了这本书以后，我去书店和图书馆，总注意有没有这套三部曲回忆录的另外两本：《我母亲的城堡》、《秘密的时代》，或帕尼奥尔其它的书。在中文书库里再也找不到帕尼奥尔其它作品。每次失望，都使我产生一种冲动：学法文。

文学史上靠回忆录式小说不朽的作家大有人在。在我印象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底层》、和《大学》。中国现当代作家之中有好几位承认，是在这套书的影响下走上文学道路。回忆录小说不朽的较新例子是法国作家马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国内地至今方兴未艾的杜拉斯热，起自于杜拉斯七十岁时写作的回忆录式小说《情人》，八十年代中，内地曾同时出现四种《情人》的译本。每一本都卖得很热。港台也都有各自的《情人》译本。尤其是一九九六年出了同名电影之后，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市面上一时洛阳纸贵，居然买不到。

据说，赛珍珠当年爆出大冷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面上靠的是她那部史诗式小说《大地》，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得力于她的两部回忆录式小说《异乡客》和《战斗的天使》。特别是以她母亲为主人公的《异乡客》，评委之一、写《尼尔斯骑鹅历险记》的瑞典作家拉格洛孚读了这本书特别感动，因而给赛珍珠投下了关键的一票。

《我父亲的光荣》显然没为作者带来上述那些作品的光荣。尽管这本书的中译本1997年就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但似乎很快就埋没在新书的汪洋大海中。内地的同行们似乎没人注意到它。不久前，我向一位来香港找资料的法国汉学家朋友谈起这位作家，她起初一愣，待翻过我找来的中译本后，才恍然道：“哦，是他。不错，一位很好的南方老作家。属于古典派。”



Marcel Pagnol (1895-1974)